

对话是深入人脑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谭 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潮流不断冲击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时期，人们心里承受过多的变化之后，个体的行为准则、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受到超负荷的冲击，必然产生无穷的振荡。由于各人年龄、经历、文化、地位、行业以至利益的不同，对这场大变革的许多问题，也会有种种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并不足怪。相反，它标志着我们国家正在走向民主化，表明群众都在积极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但必须明确的是，改革开放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其根本保证就是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此，需要创造各种生动活泼的方法，以便在民主和谐的气氛中解决人们心理需求的各种新问题，逐步求得思想认识的一致，求得思想工作主体与客体更趋完善和统一。

而对话，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好方法，它伴随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应运而生。赵紫阳同志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正面教育一定要做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很强的说服力。形式和方法可以多种多样。比如说，可不可以组织一些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熟悉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实际的、比较有水平的同志到群众中去直接对话，解答他们关心的问题，澄清一些模糊

认识。互相对话，你问我答，有来有往，有针对性又生动活泼。”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对话”是一种深入人脑的思想政治工作好方法，值得大力提倡和广推。

“对话法”的运用，就其思想工作方法本身来说，有一定的必然性。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思想工作围绕政治运动进行，其内容也着重解决政治立场，阶级观点，斗争态度等问题。在这个时期，压制、堵塞与打击的方法一度流行。这些方法压抑人的个性，封闭人的思维，打击人的积极性，给我们的事业造成的危害和后果是巨大的。后来，又出现了一种习惯上叫做“打通思想”的方法，当中虽有说服教育的意思，语气也较委婉，但实际上往往是你打我通，打而不通则进行批评以至批判，让人被动地接受。这种方法之不佳，已为历史所证明，在今天更难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甚至会形成一种逆反心理，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

我们认为，在思想工作中所运用的理论，实施的方法和计划，以及采取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有效，不能以教育者的主观愿望作为衡量的标准，而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即使思想工作实施方案、计划和方法是在实践中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一定材料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但仍然是观念形

态的东西，是否正确地反映了人的思想实际，还有待于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和修正。同时，受教育者的思想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如经济的、政治的以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也会不断发生变化。因而，原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方案、计划和方法也必须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和内容，加以丰富和发展。

在我们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想工作要有效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首先是它的内容应该扩大，应该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除了政治性内容以外，还应包括非政治性内容。从起码的社会公德，日常的文明行为，审美意向，恋爱、婚姻、家庭和其他各种人际关系，作风和情操，劳动纪律和工作态度，职业道德直至思维方法，政治立场，人生观，世界观……都应置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视野之内。“对话法”正是适应而且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包容量必须扩大的这一历史需求。在“对话”中，大至国际时事，改革开放，小至生活细节，人际关系，无不容纳其中。这样，人们不知不觉学到了知识，受到了启迪，使思想工作轻松愉快，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改变了过去那种凡做思想工作，必触及人的灵魂的陈旧观念。

同时，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也必须较之过去有所丰富和发展。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信息传播工具有限，思想工作主要采取群众集会和个别谈话的形式和方法。建国以后，条件和情况虽有变化，但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一般还是群众运动和个别谈话这样两大类。今天，一方面开放，信息源继续扩大；另一方面，信息工具如电视机、收录机和录像机等普及程度大大提高，报刊书籍的发行量也显著增长。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些现代信息传播工具，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特殊的教育功能，并用系统的观点，把它们与传统的思想工作手段有机地

结合起来，形成社会化的思想工作网络。思想工作反对“大呼隆”，并不意味着它只能单个地进行，恰恰相反，它更加要求我们重视群体的作用。因为在新时期中，信息来源不断扩大，人际交往日益频繁，出于人们的社会心理需要，群体组织必然会发展并更加多样化，群体意识对于个人思想的影响力也相应地加强。我们在进行思想工作时，如果只着眼于个体而忽视所属的群体，那是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的。在改革、开放、搞活的形势下，我们更需要健全和开辟多种形式的“对话”渠道，充分重视群体的作用。

我们提倡和推广“对话法”，还因为它较之其它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有独特之处。首先是对话的平等性。对话双方（或几方）在地位上完全平等，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那种居高临下，以势压人，只能是训话，算不得对话。其次是对话的双向性。你来我往，不同于一方用嘴巴，而另一方只能带耳朵，而且往还反复，不限于一个回合，可以相互倾听和思考对方意见，使问题易于深入，观点易于接近，认识易于统一。第三是对话的群众性。对话可以自由参加，且不分年龄大小和地位、文化水平的高低。有的人虽未直接发言，但就象知识竞赛时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内心里实际也是对话的直接参与者。第四是对话的自觉性。它易于创造一种自觉自愿的反思气氛，大家追求的不是谁胜谁负，而是真理。一方言之有理而令人信服，他方则可以从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思维方式、论据或逻辑结构来反思自己。对话双方都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获得无穷的启迪和深思。最后是对话的灵活性。对话形式多样，不拘一格；题目可大可小，人数可多可少，时间可长可短，只要沟通了双方的思想，促使他们沿着正确方向去思考议论，就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对话”由它自身的特点所决定，对

于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对话”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方法。

民主是一定历史阶段发展的必然产物，历史上产生和存在的主要有两种类型的民主：一是资产阶级民主，一是无产阶级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无产阶级民主，其主要内容包含两点：一是全体人民当家作主，即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不同形式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的崇高权利；二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指导下，能够自主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乃是社会主义民主之根本。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又还是不成熟的，必须根据国家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然而，建设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奋斗目标，这是确定无疑的。

作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对话法，是最能体现民主、和谐、平等精神的方法，民主关系在对话中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因为，领导者要与群众对话，就要了解群众，与群众平等相处，要有宽容的大将风度，还要在平时的工作言行中以身作则，否则对话就是空谈，也不能有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各级领导都深入基层与群众对话，并接受群众监督，这是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整治官僚主义顽症的一剂良药。在对话中，群众对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批评、建议通过正常的方式提了出来。群众的建议和批评，对的，能办到的，要及时、积极地去办；限于条件，一时办不到的，应把情况告诉群众，取得谅解，即便有些意见有偏颇之处，也应该让人把话说完，然后耐心地加以解释。这样做，

就为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开辟了一条重要渠道，我们的民主生活就会出现新的局面。

第二，“对话法”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者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是增进人与人相互理解的重要方法。

思想政治工作者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人类灵魂的塑造者，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者。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可避免地要和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发生关系并受其制约，这就是人的社会性。但也不应忽视人的主体意识——主观能动性与创造力。整个社会就由有血有肉的社会个体所组成的。这一个个活的“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理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人的个性及个体意识，但又不脱离其特定的社会客体。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却常常忽视了。因而，“对话法”的运用，实际上也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思想政治工作者同时也是社会工作者。

所谓思想问题，其实质就是社会关系的失调。一个人的发展总是取决于和它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人的发展，因此，“直接群体”既是产生思想问题的温床，也是解决思想问题的关键。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着眼于“直接群体”，正确处理好个人、小群体、大群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消除有碍于现代化进程的一些非动力因素，以便团结一心奔四化。

思想政治工作者作为处理个体之间、群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社会学工作者，其目的是将自己的要求转化为个体的思想观念和信念，为此，理解是重要的中介环节。理解，可以促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感情交流，产生相互信任，形成和谐的教育气氛。由于长期积囿在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以及由改革而引起的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理解”的呼声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前方战士从心底里、从灵魂

深处喊出了“理解万岁”，足见他们对“理解”的百般渴望；上下辈之间的“代沟”，正强烈呼唤“理解”来填平；不同工种、职业造成的利益不均，以及不同地位的人们，也希望在他们之间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渴望理解，增进相互感情，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可是，不少思想政治工作者，常常忽视甚至还没意识到人们的这种心理意向与个体追求，仍一味强调灌输，采取老一套的模式化、单色调的工作方法，因而，致使一些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总是处于被动与软弱无力的状态。而“对话法”则不同，它是顺应历史潮流与人们心理的共同愿望应运而生的，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重要渠道，是连接不同地位、不同年龄以及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的感情并使之和谐统一的纽带。

第三，“对话法”是更能适应当代青年特点的方法。

青年从来都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对象。塑造他们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四化大业的成败。当代青年大都是在十年动乱中成长起来的，理又处于社会大变革及第三次科技大革命的年代，因而他们仍具有以下特点。一，渴望四化，不满现状，勇于改革，但又要求过高过急，容易丧失信心；二，思想活跃，勤于思考，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看问题往往容易片面和偏激；三，讲究实际，反对空谈，注重物质利益，但也有部分人不讲远大理想，热衷于个人的眼前利益；四，热烈追求民主，拥护改革，敢于发表意见，提出问题，但易受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影响；五，求知欲旺盛，强烈追求各种新鲜知识，迫切希望了解外部世界，但分辨是非的能力不够，有时候会把糟粕当精华，兼收并蓄。

当代青年所表现出不同以往任何时代青年的上述五个特点，使他们无论在心理还是

行动上都表现出独特的双重矛盾性，理想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存在较大距离。在社会上，有些人往往离开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这一代青年，因而指责多、埋怨多，关心少、理解更少，看不到他们的长处、本质与主流。使许多青年满腔热血得不到倾洒，浑身干劲没地方使，于是便产生困惑与徬徨。面对现实生活中许多耳闻目睹的人和事又往往看不惯，因而牢骚满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殷切渴望得到上一辈人的指点与理解，更希望获得同龄人的相互理解与支持。采取“对话”的方式，无疑是了解青年思想动向与心理特征，以及在对话反思中寻求一种心灵的呼唤，情感的碰撞与谐振的重要途径。因为对话，是让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见识和措施，牢骚与不满等积极因素与非积极因素暴露无遗的有效的方法，旺盛精力与独特性格追求的最好场所。而当前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较多地注意了引导，对疏通这一环节却重视不够——即对“创造条件让大家畅所欲言，把各种意见和心里话讲出来”重视不够。而真正要把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做扎实，使人心悦诚服，就必须了解青年的思想动向、心理意向与个人志趣。否则，思想政治工作就很难做到“点”子上，不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所以，“对话法”的运用，在青年中就显得十分迫切。

第四，“对话法”是一种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愉快的思想教育，它展现出一种高超的教育艺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集思想性、知识性、生动性于一体，熔形象性、艺术性于一炉，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对话法”的绝妙之处，就在于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自觉与不自觉

之间，已达到了引导人、教育人的目的。因为双方对话的过程就是自觉自愿反思的过程。人总是追求真理的，哪一方正确，我们的思想最终是要趋向那一方的。对话中，在谈自己正确的观点与意见时，便包含有引导对方的成分；另一方随着对话的不断深入，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修正错误，趋向正确，虽然他或许并没意识到自己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对方的影响。这正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对话法”的生动活泼的另一具体体现是能最大限度地尊重和激发青年的自尊心。自尊心是人们的一种心理需要，它表现为自尊、自重，来自一个人的情绪体验和意志行动。个人自尊心的心理需求倘能得到满足，就会体验到安慰与欢快的情绪；反之，则会感到紧张与不安。自尊之心，人皆有之，特别是青年更为强烈。青年最怕的莫过于自己的价值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渐渐由自尊变成了自卑。在不拘一格的对话过程中，人们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对话中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上接第59页）

丹所需要的肥料不同，你用松树的肥料培养牡丹，牡丹会瘦死，反之，你用牡丹的肥料培养松树，松树受不了，会被烧死。培养儿童的创造力要同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发现他们的特点，而施以适宜之肥料、水分、太阳光，并须除害虫，这样，他们才能欣欣向荣，否则不能免于枯萎。”（第309页）这比喻是十分恰当的。陶行知所创办的育才学校就这么重视因材施教。学校除设置管修课外，还开设了特修课，前者占三分之二，后者占三分之一。两类课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同时，在学生中还分设了音乐、戏剧、文学、社会、自然、绘画六组，依据智慧测验、特殊测验选拔儿童加入最适合其才

再有，对话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对话的双方，都力求阐明自己的观点，说服对方，因而往往力求把抽象深奥的道理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这就需要综合各门知识，广征博引，采取多种形式，层次分明地来说明某一问题。实际上，对话是人生理想、语言艺术、理论素养、知识水平的一个综合性活动。同时，在对话中，人们也可以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增强思维的敏捷性和辩论的实际经验，增强应变能力及分析问题的能力等等。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话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1985年秋，部分大学生闹学潮，当时许多省市领导分别到各大学与学生直接对话，加深了当代大学生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进一步认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相信，“对话”这种深入人脑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一定会为更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所重视，并且在实践中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

能兴趣之一组学习，以期各得其所。对一时不能发现其特长的学生，或各方面都有才能的学生，便设普通组以教育。对中途发现不适合某一组的学生，可以让他转组学习。这样，学生不但懂得一般做人的道理和学习基本文化知识，而且培养了各人的特殊才能。这些主张和实践都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目前强调学校教育要开辟第二课堂，开展各种兴趣小组活动和各类专题讲座，不正是与陶行知教学法理论相吻合吗？当然，我们今天的教学工作，远远超过了陶行知时代，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但是，陶行知教学法理论，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